Globethics Repository



聽不見的聲音：關於中國基督教城市民工教會的研究——以《都市裏的鄉村教會》為中心 [Unheard Voices: Study on the Migrant Workers Church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 Review of Country Churches in Cities (Abstract)]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YUAN, Ho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11-06 09:16:27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4427

聽不見的聲音：關於中國基督教城市民工教會的研究

——以《都市裏的鄉村教會》為中心

袁浩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候選人

改革開放以來，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在中國的復興，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中的一個熱點議題，亦引起學術界較多關注。而海內外學術機構關於中國基督徒人數的調研與爭論為此做了一個很好的注腳。[1]學界對中國基督教的研究，更多是探討基督教復興的原因，以及相應的政教關係問題。為學界所忽略的是不同社會經濟與文化處境下中國基督教自身的變遷。比如，中國急劇的社會變遷與城市化，對中國基督教的分佈有何影響？遷移到城市中的鄉村基督徒，其生活與信仰如何？黃劍波的《都市裏的鄉村教會：中國城市化與民工基督教》（香港：道風書社，2012），回應了上面的學術問題。筆者亦十分關注城市民工教會發展，並作跟蹤調查研究。從二〇一〇年至今，筆者每年都赴北京做民工教會的田野調查。結合我的參與觀察及訪談，本文評述《都市裏的鄉村教會》（以下簡稱《教會》一書，

1. 二〇一〇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宗教藍皮書》中公佈全國基督教入戶調查資料，中國基督徒人數2,305萬，佔全國總人口的1.8%；二〇一一年美國皮爾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發佈調查研究資料，認為二〇一〇年中國基督徒人數6,707萬，佔總人口5.1%。

同時提出若干討論的議題請教於諸位學者。）[2]

一、該書簡紹

《教會》是在貝勒大學宗教研究所（Institute for Studies of Religion, Baylor University）支持下的一項團隊合作的集體成果。是項研究的田野調查涉及諸多城市，如北京、上海、重慶、大連、昆明、延邊等城市，形成較為豐富的調查報告。該書以二十一世紀初北京民工教會A[3]為主要研究對象，並輔以其他城市民工教會的個案，採用人類學、社會學研究路徑，重點對民工基督徒的歸信與信仰維持進行多維度的詮釋。該書提出許多有價值的研究問題：如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的城市化處境、城市化對鄉村教會與城市教會的衝擊、社會變遷與中國基督教類型的新劃分、弱勢群體歸信基督教的社會科學之解釋等。此書還提出一些重要的理論關懷，如文化與傳統的斷裂、延續性，基督教的普世性與地方性等。對於重要的研究問題，該書嘗試回答這些問題，且給出一些精彩的答案。

二、城市化與民工教會

在當代中國，對民工基督徒信仰與生活的理解，必須置放在一個更加廣闊的社會政治與文化處境當中，而城市化是其中一個重要處境。一九八〇年代以來由政府、市場等因素推動下的城市化，帶來中國人口持續大遷移，大量

2. 關於當代北京基督教研究的課題，得到普度大學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The Center on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at Purdue University）的支持，得益於過去兩年與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邢福增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劉紹麟博士歷次的小組討論，特此感謝。
3. 教會系統A，其母會是安徽鄉村地區一著名家庭教會團隊，興起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現發展成為一跨省份的教會系統。

人口從農村向城市流動。[4]幾乎同一時期，一九八〇年代之後的二十年基督教在中國鄉村復興與發展，尤其是河南、安徽、溫州地區。農村人口往外省流動，農村基督徒亦被人口流動這個社會變遷所席捲，往城市遷移尋找工作。

本書用一章從社會學角度探討生成民工的城市化及其結果，指出中國城市化的兩個特徵：作為制度安排的戶口制度，基於利益選擇的城市准入制度。作者認為這兩個制度性因素是中國民工身份及社會問題生成的關鍵。[5]作為城市化的一個結果——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作者用「中心與邊緣」的依附理論來解釋，認為是中國城市與農村二元對立的框架形成了中心與邊緣的格局。

推動鄉村人口外出的一個宏觀因素在於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之間形成的「中心－邊緣格局」。而來自中心的生產體系的擴展破壞了邊緣地區的傳統經濟結構和組織，導致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出現，同時中心的發展又愈來愈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大量人口是從邊緣流向中心。這樣，中心與邊緣形成互相依附和彼此連結的態勢。[6]

基於拉美發展經驗的「中心與邊緣」依附理論，能否有效解釋中國鄉村人口向城市轉移之原因？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蘇黛瑞（Dorothy J. Solinger）的研究成果無法迴避。關於一九八〇年代以來中國農村人口流動，蘇黛瑞用推拉理論模式、歷史結構模式

4. 一九九〇年代以來中國人口大遷移，以河南省為例說明。河南省是中國農業人口大省，長期以來河南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居全國首位。二〇〇四年年底，全省轉移的農村勞動力達 1,380 萬，省外務工者 705 萬，省內務工者 673 萬。而到二〇一〇年上半年，全省農村勞動力轉移高達 2,363 萬，省內轉移 1,140 萬，省外轉移 1,200 萬之多。數據源自曹明，〈新時期河南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主要特點及發展趨勢分析〉，載《企業活力》7（2011），頁 48-53。
5. 黃劍波，《都市裏的鄉村教會——中國城市化與民工基督教》（香港：道風書社，2012），頁 38。
6. 同上，頁 33。

與中觀的社會關係模式，回答不同類型的農村地區之人口外流之原因。具體而言，中國鄉村人口向城市遷移，其推力因素有國家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勞務輸出省份的生態系統；社會關係網則被視為鄉村人口流出的拉力因素。中國鄉村人口往城市的流動，是政治經濟等多重因素交織在一起的結果。顯然，中心邊緣的依附理論並不能解釋這個複雜的社會現象。

要追問的是，中國的城市化是一種怎樣的城市化？具體而言，除戶口制度及城市准入制度之特徵外，它還有怎樣的特徵？這些特徵如何影響到民工基督徒的信仰與生活，以及民工教會自身的變遷？

蘇黛瑞用「中心與邊緣」理論解釋了流動人口與老家仍然保持着無法割裂的聯繫，除少數擁有很大經濟資本與社會資本的群體，中國流動人口很難融入中心成為城市公民，而不得不回到農村。[7]這是中國城市化的又一重要特徵，正是這個特徵很大程度決定民工階層的未來。不可忽略的是，這一特徵亦很大程度決定民工基督徒與民工教會未來發展，民工基督徒大多數城市中的客旅，從而民工教會僅僅是一個暫時的、流動的信仰共同體。

該書作者所使用的城市化，強調在宏觀層面城鄉之間的差異與人口流動。研究民工基督徒及民工教會，不容忽視的是一個處境是微觀意義上的城市化，如某一個城市的城市化。農村基督徒進入城市之後，所面對的並非一個靜止的城市與社會，而是需面對急速的社會變遷。北京自一九九〇年代以來，城區面積向周圍擴張至三環四環；隨城區面積不斷擴大，城市邊緣的農村而不斷被拆遷。這種變

7. 蘇黛瑞著，王春光、單麗卿譯，《在中國城市中爭取公民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頁 160-164。

遷制約民工基督徒生活區域與職業的選擇，制約民工教會宗教活動場所的選擇。近些年北京民工教會的部分領袖看到城市化與拆遷給教會所帶來的危機，因此推動民工教會的轉型，推動民工教會融入城市生活。教會轉型體現在這樣幾方面，教會活動場所從平房遷至城市居民區的樓房，力圖改變會眾構成的同質性而追求多樣性的群體，改變非制度化的教會建制，不再單單堅持靈恩色彩的宣教方式，講究理性的信仰表達等。從教會轉型而言，民工教會不再單單是「城市中的鄉村教會」，而是處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帶有某種過渡的性質。

中國城市化的上述四方面特徵，構成民工基督徒與民工教會的具體處境，而這些具體處境有助於我們理解民工基督徒的信仰與生活，以及民工教會在城市生活中的變與不變。

三、民工基督徒的教會選擇

對於基督徒而言，信仰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參與教會，離鄉背井的民工基督徒亦不例外。該書指出，鄉村基督徒進入城市之後，由於不熟悉城市環境，建築物較為公開的三自系統大教堂成了第一選擇。而那些來自獨立鄉村教會系統的基督徒，通常會選擇非三自教會。對於家庭教會而言，民工基督徒更傾向參與傳統家庭教會的聚會，與所謂的由知識分子與專業人士組成新興家庭教會保持着疏離感，或者很難融入。[8]此外，與以上兩個選項不同的是，民工基督徒建立起主要由民工群體組成的教會——民工教會。作者認為，民工教會的形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鄉村教會的特徵，因此暫且稱為「都市裏的鄉村教會」。[9]

8. 黃劍波，《都市裏的鄉村教會》，頁 53-58。
9. 同上，頁 65。

作者對民工基督徒教會選擇的分類，主要基於北京民工基督徒的宗教經驗，如崇文門堂、珠市口堂、新興城市家庭教會等。結合二〇一一至二〇一二年對北京基督教的田野經歷，我嘗試對民工基督徒其教會歸屬進行更全面的分類與解釋。

1. 參與三自教會

以北京基督教海澱堂為例，海澱堂主日崇拜有五堂，除英語堂，其他四堂皆有民工基督徒參與。海澱堂下屬聚會點多達四十個，散佈於北京市海澱區。[10]有幾個聚會點的會眾構成以民工基督徒為主，如西北旺聚會點與香山聚會點。[11]筆者於二〇一一年六至七月參加海澱堂新人接待、查經班、見證禱告會，都遇到參與信仰活動的民工基督徒。論及海澱堂會眾的構成，海澱堂主任牧師WWQ如此說：

> 很難說海澱堂會眾以哪個群體為主，或許可以說是非常多元化。有大學生、大學教師、公司白領、退休職工、各省份來的農民工等。對我們而言，會眾如此多元，會眾牧養是一個挑戰。[12]

經過訪談，有這樣幾個有趣的發現：首先，民工基督徒參與三自教會，與他們此前的教會歸屬有很高的相關性。他們往往來自家鄉的三自教會或者對三自教會沒有強烈排斥感的其他類型教會。其次，來自鄉村家庭教會的基督徒，年青一代較之於信仰先輩缺少政教衝突的信仰經

10. 海澱堂官方網站（http://www.hdchurch.org/home.html〔瀏覽於 2013 年 4 月 22 日〕）。
11. 二〇一一年三月訪談海澱堂同工WJQ。
12. 二〇一一年三月訪談海澱堂主任牧師WWQ。

驗，以及對中國基督教歷史問題的認知，他們參與三自或家庭教會並非是一個二元對立的選擇。

2. 參與家庭教會

民工基督徒較少參與新興家庭教會，主要原因是這類教會與民工基督徒生活及工作區域的距離太遠。新興家庭教會多分佈在市區，而民工群體多居住於四環五環之外城郊，交通成本與時間是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因素。其次，民工基督徒群體缺少了解新興家庭教會的社會網路。有少數民工基督徒參加新興家庭教會，一段時間之後發現並不能融入教會，於是選擇離開教會。訪談中有信徒認為他們與教會學生、知識份子及專業人士沒有共同話題，很難聽懂主日證道；而且他們工作太忙無法委身教會及小組團契；他們內心深處亦有自卑，與信眾存有很大隔閡。[13]民工基督徒在新興家庭教會教會很難委身，往往轉而參加其他類型的教會。

3. 參與溫州人教會

一九八〇年代後期以來，隨溫州商業網絡的向外拓展，溫州商人及溫州基督徒亦從本土遷至全國大中城市。一九九〇年代北京的溫州人開始興起。發展之始溫州人教會的地區主義色彩較濃，其成員基本是溫州基督徒。近些年有溫州人教會開始轉型，嘗試吸收非溫州籍同工與信徒，以改變會眾構成較為單一的局面。筆者曾參與觀察北京兩間大型溫州人教會系統，與之有聯繫的聚會點有四十個左右。這兩間溫州人教會吸納相當一部分民工基督徒。溫州人教會有兩個特點促使民工基督徒參與之，一是信徒工作或居住區域距離溫州人教會較為近便。另一個原因

13. 二〇一一年六月訪談北京ZGC教會民工基督徒A與B。

是，溫州人教會有許多基督徒老闆，他們有豐富的社會關係網路與經濟資本，且願意幫助民工基督徒找工作。

4. 民工教會

北京民工教會的建立並非是民工基督徒自發成立，河南、安徽等農村大型教會系統的城市宣教是城市民工教會興起的組織動力。于建嵘在其研究報告中提到安徽YS團契及河南CG團契。[14]這兩家農村家庭教會系統從一九九〇年代末開始城市宣教，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建立起規模龐大、聚會點眾多的民工教會系統。比如，CG團契在北京的一個牧區有接近三十個聚會點，民工基督徒大約二千人。

5. 由民工基督徒自發組成的禱告會、見證會

筆者曾在北京偏遠郊區的馬連店、沙河參與過這類信仰活動。居住在同一個區域的民工基督徒，因信仰生活的需要，由較為成熟信徒組織見證會、禱告會。這類信仰活動人數較少，從幾個到十幾個不等。其形式較為單一，一般沒有查經；一是他們受教育程度低，較難獨立閱讀《聖經》；二是小組與團契缺少成熟信徒。這種自發的信仰活動往往被溫州人教會或民工教會系統所吸納成為聚會點。

民工基督徒對教會的選擇及參與，與這樣幾個因素存在密切聯繫。第一，居住或工作區域與教會的距離。基於交通時間與成本，民工基督徒一般選擇距離近的教會。第二，民工基督徒的社會網路。民工基督徒的進城、生活與工作往往離不開親戚、朋友及老鄉的介紹。同樣，民工基督徒了解教會亦離不開別人的介紹。第三，民工基督徒在

14. 于建嵘，《為基督教家庭教會脱敏》，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份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演講（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article/2008/12/1696.html〔瀏覽於2013年4月22日〕）。

家鄉所屬教會的身份。家鄉教會若具有濃厚的排他性，一般那他們會選擇同一種類型的教會。第四，教會對民工基督徒的適切度。民工基督徒一般不會選擇與自己社會文化差異較大的教會。

四、歸信的社會科學解釋

本書的一個研究問題是：作為弱勢群體的民工基督徒，其歸信的社會科學詮釋如何？作者從三個維度去闡釋民工基督徒的歸信：實用主義的解釋、宗教作為文化體系對生活的解釋、基於身份與承認的解釋。

關於弱勢群體的宗教皈依，海內外學術界相關研究已是非常豐富。大致有這樣幾類解釋框架：一、宗教歸信可獲取經濟利益、社會資本與政治機會；二、宗教歸信是個體或群體身份認同的需要。李榭熙以十九世紀廣東潮汕鄉村基督教為研究對象，他發現當地宗族以基督教作為政治手段，增加在族群爭鬥中的社會資本與權力資源。[15]劉達芳（Liu Tat Fong）以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水上社群為研究對象，探討他們如何借宗教及族群身份，使用自己處境中的有利資源，創造屬於自己的宗教禮儀與方式，以便提升其群體的社會地位。[16]李榭熙與劉達芳對弱勢群體的宗教皈依，都是從實用主義路徑解釋的。

本書研究以翔實的訪談來詮釋民工基督徒歸信的實用主義傾向。但他並沒有停留於此，因為實用主義的解釋是有局限性的。如果民工基督徒的歸信基於功利主義、實用

15. 李榭熙，《聖經與槍炮：基督教與潮州社會（1860-190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16. Liu Tat Fong，《爭取社會地位：香港水上人的宗教與種族》（Negotiating Social Status: Religion and Ethnicity in a Seui Seuhng Yahn Settlement in Hong Kong；1999 年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博士論文）。

主義，但民工基督教處在苦難當中——無論是經濟貧困、疾病、社會歧視、身份迷茫以及政府苛刻的管制，如何解釋民工基督徒依然持守基督教信仰？按照實用主義的分析模式，遭遇苦難且信仰對解決苦難失效的情況下，基督徒會放棄信仰抑或轉而尋求其他的信仰。生活中固然存在這樣的信徒，但也存在同樣處境的基督徒卻依然堅持信仰？這種宗教現象是實用主義的分析模式難以解釋的。

高健松（Jason Kindopp）的《當代中國的新教政治》（The Politics of Protestant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提及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農村家庭教會中的積極參與者往往面臨官方苛刻的管制，他嘗試解釋為甚麼他們仍然願意為信仰付出沉重代價。高健松認為原因在於這個群體的解釋框架（interpretive frames）——他們擁有的世界觀及共有的信仰。而這恰恰促使這個弱勢群體建造一個更加緊密的團體，去抗爭外在壓力。[17]同樣的，面臨這樣的困境，如何解釋民工基督徒在諸多苦難中仍然持守信仰？該書採用宗教作為文化體系對生活意義的解釋，而這個分析框架補充了實用主義的分析模式。格爾茨（Clifford Geertz）的理論認為，宗教作為一種象徵體系，可以對生活世界中的不合理和不安提供解釋，從而使得具體的生活處境以至苦難成為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社會現實。[18]

關於民工基督徒歸信的部分，該書採用訪談的研究方法，過訪談形成研究的文本，從文本分析得出結論，比如民工基督徒實用主義信仰的結論。需留心這種研究方法的

17. Jason Kindopp，《當代中國的新教政治：一黨國家的國家控制、公民社會及社會運動》（The Politics of Protestant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te Control, Civil Society, and Social Movement in a Single Party-state;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2004），頁 365-366。
18. 黃劍波，《都市裏的鄉村教會》，頁 79-80。

不足之處。將一個群體信仰簡單歸類為某種主義，是否對複雜宗教現象的一種約化（reductionism）？研究過於倚重田野中的訪談材料，完全從信徒的見證出發，這脫離信徒的處境，對文本的分析難免有偏差。筆者曾參加民工教會的主日崇拜，發現民工基督徒的表達能力非常有限。當禮拜結束，教會傳道按照事先安排的程序邀請信徒做見證時，筆者看到做見證的信徒分享不足兩分鐘就結束。並不是信徒沒有準備好做見證，因為教會傳道已請他們提前準備分享。民工基督徒這個群體的表達能力非常有限，研究者需挖掘被訪談者所沒有表達無法表達的精神世界。

五、理論關懷：文化的延續與斷裂，以及傳統與現代

作者在開篇便提及該書不僅討論案例，還有更大的理論關懷：一是文化斷裂與延續問題；二是普世基督教的地方性表達。而筆者在此主要討論民工基督徒歸信所揭示的文化斷裂與延續之議題，以及背後隱藏的傳統與現代之思考。作者提出文化延續與斷裂的理論關懷如下：

而這從更大的層面上來說，其實是希望能用這些案例來討論所謂文化斷裂與延續的問題，因為在這些民工基督徒身上可以看到兩種重要的變化：城鄉之變與信仰之變。但是這種變化是否意味着就是完全的斷裂？如果說有延續的話，又是在甚麼意義上的延續，或者說採用了哪些方式確保了延續？而這個文化變遷的議題無疑是普通人類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界都關注的問題。特別是其變遷的動力，變遷的模式以及變遷的走向。[19]

該書提到，研究中國基督教的學者所關注的基督徒歸信，注重歸信對於傳統中國文化而言的斷裂。對此，作者

19. 同上，23 頁。

承認民工基督徒的歸信很大程度擺脫傳統文化及社會關係。但是他亦強調這種斷裂並非絕對，民工基督徒雖然歸信，但仍存在原有社會關係及文化觀念的延續，並以各種形式隱藏於民工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中。[20]筆者認為作者這個判斷十分中肯。從本書的訪談及筆者收集的田野資料而論，文化變遷過程中呈現甚麼樣的模式是複雜的，有斷裂、有延續，亦有不同形式的延續與複製，還有創造性的更新。

筆者在河南一大型農村教會系統B[21]的神學講義《救恩資訊》中，看到文化變遷中其衝突與斷裂的一面。《資訊》以《舊約》十誡為原則，對基督教裏的罪進行具體解釋。而後《資訊》具體列出何謂基督徒的罪行，就「節期之罪」，《資訊》一文列舉基督徒不當做的罪行：

> 臘月二十三：祭灶、放炮；大年三十：請祖宗、上墳燒、貼門神、放攔門杠、撒灰、綁芝麻杆、不准空鍋、不准斷火、不叫小孩子做門檻；三十晚上熬年、不准梳頭、不叫照鏡子；初一男人先起來開門、啞巴不准叫門、不准倒水、掃地；祭祖、祭天、拜老人、發壓歲錢、拜年、不准說東西少與壞；十五十六元宵節看燈花、放煙火、送祖宗；清明節上墳、掃墓、插柳枝、掛白紙條；五月初五端午節：吃粽子、吃雞鴨鵝蛋、拜屈原；七月七拜牛郎織女、葡萄架下聽佳音；八月十五拜月亮、吃月餅；九月九重陽節：喝米酒、插茱萸……

中國傳統節日，如春節、元宵節、端午節、清明節、重陽節等，其節日、儀式與儀式的意涵構成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對此，鄉村教會系統 B 的神學將傳統節日的設置以

20. 同上，126 頁。
21. 鄉村教會系統B，一九八〇年代興起，主要在農村地區發展，與黃教授筆下的A教會系統一樣，有全國性的宣教網路。

及儀式解讀為基督徒的罪行而加以摒棄。這樣基本割斷與中國傳統的關係。教會系統 B 的個案，讓我們看到文化變遷中斷裂的一面。

作者在書中提及一個宗教現象，即北京民工教會系統 A 中的「開禮拜」。無獨有偶，筆者於二〇一二年八月訪談北京民工教會系統 C 一位河南籍基督徒時，亦有提及：

問：開禮拜？可否再多介紹一下？

答：這間教會連一個有高文化的人都沒有，最多就是初中生，我們都是小學。平時咱沒有感覺自己多有信心，可是別人家裏鬧鬼，有甚麼事，請我們去「開禮拜」。就是家裏有甚麼事，請幾個同工和傳道人去他家讚美禱告，只要到他家一禱告，馬上就好了。神特別照顧。

問：不一定是禮拜天？

答：對，隨時都可以。預約時間，和同工一起過去，這是我們老家的傳統。他自己沒有信心。當然，是神給我們的特權。他也知道禱告，但沒那麼大信心，所以就請別的姊妹，生命好點的為他禱告，一禱告他就感動，就好了。平時沒有感覺自己信得好，真的感覺有時候疲乏，可是就是願意為神做事，出去為人禱告啊，看看病人啊，都挺受感動的。有的病人，去他家「開禮拜」，今天去，明天去，他就好了。還有晚上睡不着覺，恐懼啊，上他家一禱告就好了，就平安了。就特別奇妙。被鬼附，只要到他家一禱告，就下去了。基督的力量多大啊！你奉耶穌的名為他禱告，鬼就跑了。鬼借着那個人跟你說話，跟你對話，挺害怕的。我們時間長了，經歷多了就知道：要借耶穌的名，只靠自己是不行的。

事情都是有順序的，誰該做甚麼都有安排。像「開禮拜」不是很重要的，我們就去。害大病的劉牧師會去；像小一點

的，生個小孩、娶媳婦，開喜禮拜、平安禮拜。各種各樣的，不一樣。

北京民工教會系統B，會眾主要以河南基督徒為主。而開禮拜的形式多樣，包括喜禮拜、平安禮拜等是河南鄉村基督教的傳統與儀式。鄉村基督徒遷移北京之後，他們將地方基督教的傳統、禮儀複製到北京新的教會,仍然維持原有的信仰表達。海坡恩（Joel Halpern）曾提到這樣一種社會現象——城市農村化，大意就是鄉村人遷移到城市之後，將原有的鄉村生活模式、文化習慣複製到城市生活中。[22]然而，就河南鄉村基督教開禮拜的宗教傳統與儀式，在北京城市的民工教會中得到複製與再現，我們看到文化變遷過程中文化延續性的一面。那麼，開禮拜，與中國傳統文化存在甚麼關係？該書認為，這看起來與民間宗教中許願還願的模式極為相似。[23]筆者不敢認同這種觀點，筆者以為開禮拜是鄉村基督徒對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是用傳統文化與宗教的形式來表達基督教信仰的實質，是「新酒裝在舊皮袋」。而鄉村基督教注重趕鬼醫治，筆者以為梁家麟的解釋更為有力，鄉村基督教是一種復原主義樣式的信仰。[24]

在城市的不同地區，居民生活方式千差萬別，傳統生活方式與現代生活方式並存，往往互相交織在一起。如何理解與對待傳統，或者說傳統文化？希爾斯（Edward Shils）認為：

22. 史蒂文．瓦戈著，梁坤、邢朝國譯，《社會變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 88-89。
23. 黃劍波，《都市裏的鄉村教會》，頁 75。
24. 參考梁家麟，《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基督教》（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第十章「農村教會的危機與未來」，頁 408-438。

> 傳統文化是圍繞人類的不同活動領域而形成的代代相傳的行為方式，是人類在歷史長河中的長久積澱，是一種對社會行為具有規範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時也是人類在歷史的長河中的創造性想象的結果。因而一個社會不可能完全破除其傳統，一切從頭開始或者完全，而只能在新的傳統的基礎上對其繼續創造性的改造。[25]

對於文化變遷以及傳統與現代，著者認為：

> 傳統與現代的二元敘事影響了我們對文化變遷的認識，但絕不是說這個敘事方式完全失效或是一種錯誤。事實上，它仍然是，並可能一直是我們理解近代中國以及當下中國的一個重要的框架，我們真正不同意的是那種片面強調在中國近代社會變遷過程中的斷裂這個方面。[26]

事實上，金耀基對傳統與現代的關係有非常深刻的認識，與該書的觀點有相同之處。金耀基認為許多人易用二分法思考問題，這樣容易掉進理論兩極化的陷阱中。若是認為走出傳統就進入現代，這是不符合邏輯，亦不符合事實。

> 從傳統到現代是一條漫長的道路……誠如奧門（Gabriel A. Almord）告訴我們，我們不可視之為靜態的，而必須把它看作一個動態的連續體……對於當代中國社會，有些非常現代，有些非常傳統……[27]

25. 希爾斯著，傅鏗、呂樂譯，《論傳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 7。
26. 黃劍波，《都市裏的鄉村教會》，頁 126-127。
27. 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頁 69。

> 社會抑或文化，從傳統到現代的變遷，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是一個連續體。如黃教授書中所說，這裏要努力整合整個過程，則是在一種成為（becoming）意義上探索。[28]

六、結論及期待

該書通過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將北京等城市民工教會的信仰與生活，栩栩如生地展現在讀者面前，而且給出許多有趣且有價值的詮釋，拉近了研究者、被研究者以及讀者之間的距離。該書的精彩與貢獻不再贅述，筆者試圖通過以上四方面的評述表達不同的觀點或者補充該書忽略之處。如有期待，正如高師寧在序言中提到的：都市裏的鄉村教會是否可能融入城市生活？如果可能，那麼融入城市的動力機制是甚麼？宗教身份在這個融入的過程中扮演何等角色？期待作者以後的研究。該書是項研究開創中國城市基督教研究的先河，不論如何，這一學術貢獻是要記入中國基督教研究的學術史中。

關鍵詞：城市化　教會選擇　歸信解釋

作者電郵地址：yuanzhuangzhuang@gmail.com

28. 黃劍波，《都市裏的鄉村教會》，頁 127。

Unheard Voices: Study on the Migrant Workers Church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Review of *Country Churches in Cities*

YUAN Ho
Ph.D. Candidat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Contemporary Chinese Christianity has been shaped by the dual social changes since 1980, which are the revival of rural Christian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One significant phenomenon is the rise of migrant church in cities. By commenting on the book "*Country Churches in Citi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deeply the four issues about the migrant church: urbanization, migrant workers' choices of church, descriptions of their conversion, and relevant theories. And the author also proposes other possible explanations for the conclusions of the book.

Keywords: Urbanization; Choices of Church; Descriptions of Conversion